

虚假的逻辑延伸与真实的思想断裂

——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发生学路径考察

李 明

摘 要: 拉克劳与墨菲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危机应对史的梳理来阐明后马克思主义是从批判虚构的工人阶级同一性的视角上对马克思主义作出的一种新的理论探索。通过对马克思主义霸权谱系的考察来论述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逻辑必然。但事实上,以后现代主义为主搭建而成的多重杂合的理论场域才是后马克思主义发生学的思想基础。后马克思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种虚假的逻辑延伸,本质上却是一场严重的、真实的思想断裂。

关键词: 后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 工人阶级; 霸权; 后现代主义

中图分类号: B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019(2014)01-0021-08

基金项目: 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重点项目(2012SQW010ZD); 安徽省高校思政课教学能手建设项目(20122013SZKJSGC9-5); 安徽大学科学发展观研究中心建设成果; 安徽大学博士人才启动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 李明,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暨科学发展观研究中心副教授,法学博士(安徽 合肥 230601)。

一般来说,后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指当代英国政治哲学家拉克劳和墨菲在1985年出版的《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①一书中基于“政治偶然性逻辑”的考量,运用后现代主义,主要是后结构主义、后精神分析学、解构主义所表达的“霸权接合”、“激进多元民主”、“话语阶级”等思想,并以此为基础而逐步形成的一种在当代西方社会颇有影响的政治哲学思潮。在理论上厘清其发生学的路径,对于理解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实质、把握其理论特征、批判其理论失误等都有着重要意义。

一、在梳理危机应对史中确立 后马克思主义“逻辑延伸”的发生学基础

拉克劳与墨菲之所以认为“后马克思主义不意味着在马克思主义之外或反马克思主义”而“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探索”^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他们看来,后马克思主义思想之“种”或“芽”早就潜伏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了,只是当今更加复杂的社会环境、更加多元的社会斗争、现实共产主义的运动遭遇到的挫折等才使后马克思主义凸显于当今时代。“当代

^① 该书英文名称为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参考的中译本名为《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这里主要涉及“hegemony”一词翻译问题。目前国内部分学者主张翻译成“霸权”,也有学者主张翻译成“领导权”。由于笔者倾向翻译成“霸权”,其理由可参见周凡《后马克思主义导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第120~125页。因此,在非引文处,凡涉及“hegemony”概念的一律使用“霸权”一词,而在引文处,笔者出于对译者的尊重均按译者的实际翻译情况加以使用,未作统一修改。另外,也有学者将“strategy”翻译成“战略”,同样出于对译者的尊重,均按译者的实际翻译情况加以使用,也未作统一修改。

^② [英]拉克劳、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尹树广、鉴传金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中译者前言第4.5页。

社会斗争的极大丰富性已经导致了理论危机,正是理论与政治之间双向运动的中间点上,我们自己的话语才得以定位”^①。因此,在拉克劳与墨菲看来,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逻辑发展与当代社会现实之间的共同作用,使那些早已存在的后马克思主义的“种”与“芽”迅速成长,从而预示着后马克思主义时代的到来。总之,在拉克劳与墨菲视界中,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种必然的“逻辑延伸”。所谓的“逻辑延伸”无非是要说明后马克思主义与传统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联系,后马克思主义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一种合法继承与发展。为了证明这种“逻辑延伸”的存在,拉克劳和墨菲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角度对此进行了发生学意义上探索,而这个角度的切入口则是始于对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危机应对史的梳理。

拉克劳与墨菲认为自19世纪末以来,马克思主义就已经出现了危机,这种危机早就潜伏在经典马克思主义文本内部的矛盾之中。“有些文本将阶级斗争在它的具体历史特征中描述为历史的动力和一种本质上能动的、创造性的元素,而另一些文本则将之描述为潜在的结构过程即生产力的发展及其内在固有的矛盾的消极表现”^②。这种矛盾一直困扰着马克思主义者,而所有的矛盾最后都集中在如何看待无产阶级斗争与命运、历史发展规律以及二者关系上来,对这两者及其关系认识不清是造成马克思主义危机的最为主要的理论困境。面对危机,拉克劳和墨菲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出现了三种应对方式。第一种是以考茨基为首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应对方式。他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于科学社会主义,实证化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从而抹杀了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中固有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的内容,形成了“关于社会结构及其对抗日益简单化的理论”,即

“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向贫困化和少数几个企业掌握财富发展,而且伴随着工人阶级的日益贫困,大量不同社会阶层和职业类型迅速地无产阶级化”^③。因此,在考茨基看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按照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无产阶级必将不断壮大和同一化,至革命时机成熟之际,作为革命主体的无产阶级通过对资产阶级的战争来摧毁资本主义社会,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拉克劳与墨菲认为考茨基之所以有上述思想,其根源在于“来自如此的观念——在历史进程中有一定按预定的方向运作并先验地保证社会主义的到来的‘发展规律’”^④。毋庸置疑,考茨基的思想观点对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影响:第一,将无产阶级的发展完全限制在外部客观条件成熟与否之中,实际上取消了无产阶级的能动性和历史主体性,从而妨碍了无产阶级的成长。这方面的错误后来受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等人的批判。第二,“历史必然规律”成为宿命论式的理论教条,这实际上忽视了历史规律的特殊性。历史规律原本就是人活动的规律,历史原本就是人创造的,任何社会制度的演变都必须有人的参与才能实现。人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⑤。第三,本质上取消了无产阶级革命。因为,首先,既然社会主义终究要实现,那么无产阶级革命岂不成了“历史的多余”。其次,什么时候革命的时机才够成熟了,什么时候无产阶级力量才足够壮大呢?考茨基表面上虽然认同无产阶级革命,但同时又把无产阶级革命无限期推延了。无怪乎,拉克劳与墨菲认为考茨基的理论特别天真和单纯。但上述批判视角并不是拉克劳与墨菲主要的理论开火点。拉克劳与墨菲要质疑考茨基的主要是无产阶级具有先验的革命主体的优先性吗?经济基础是保证了无产阶级的同一性的基础吗?纯粹的无产阶级革命可能吗?对于这三个问题的思考直

① [英]拉克劳、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第2页。

② [英]拉克劳、墨菲《社会主义的策略,下一步在哪里》,周凡译,载周凡、李惠斌《后马克思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52页。

③ [英]拉克劳、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第10~11页。

④ [英]拉克劳、墨菲《社会主义的策略,下一步在哪里》,周凡译,周凡、李惠斌《后马克思主义》,第52页。

⑤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7页。

接推动了拉克劳与墨菲后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发展。他们的答案是无产阶级革命主体的优先性并没有任何的先验保证,经济基础已经无法成为保证无产阶级的同一性的基础,纯粹的无产阶级革命绝无可能。

第二种危机应对方式是以伯恩斯坦为首的“修正主义”。伯恩斯坦认为解决理论危机的出路在于适应时代变化,按照现实发展的要求修正马克思主义。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阵营所预料的无产阶级扩大化、工人阶级赤贫化、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断爆发、社会革命高潮再度来临并没有实现。相反的却是中产阶级的出现和增长、阶级矛盾的相对缓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调控能力在不断地提高,传统理论已经无法解释现实而必须加以修正。首先,在无阶级同一性的论证上,修正主义就认为,并不是自发的经济基础成为无产阶级同一性的保障,无产阶级的同一性在于政治的自觉构造上,是无产阶级政党对工人的有效组织化才能使无产阶级整合为具有共同立场的同一性主体,从而使阶级同一由经济同一走向在党的领导下的政治同一。同时,党不但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而且也是所有受压迫阶级的政党。在社会的斗争领域中存在着复杂多元的斗争主体,但工人阶级仍然处于革命主体的中心地位。拉克劳与墨菲认为伯恩斯坦已经突破了正统马克思主义把阶级同一性束缚在经济基础上的狭隘认识,并以称赞的语气说“经济基础的政治自治形式是伯恩斯坦论点的新鲜之处。”^①并且他看到了“工人阶级日益增长的经济力量,社会合法性的发展,资本主义的‘人道化’,所有这些都导致了工人阶级的‘国有化’”^②。也就是说,工人阶级不仅是无产者,他们也是公民和消费者,业已镶嵌在资本主义国家文化和制度之内了。因此,伯恩斯坦“理解了工人阶级已经处在国家领域之上这一基础真理”^③。但拉克劳与墨菲依然认为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修正”得还不够,修正主义依然存在着经济主义

的残余,受到经济主义的限制。因为,在伯恩斯坦那里不仅存在着拉克劳与墨菲所不能容忍的阶级同一性的理论幻觉,而且其关于政治同一性理论的证明最终仍然是建立在经济之上。

拉克劳与墨菲认为修正主义虽然开创了对社会斗争的复杂性、丰富性、多元性的认知,但其理论逻辑仍被经济本质主义、阶级还原主义所牵制,只是部分地动摇了经济主义必然性的逻辑,与他们所主张的后马克思主义之间还存在着思想上的鸿沟。后马克思主义就是要扫除一切经济本质主义、阶级还原主义的残余。因而拉克劳与墨菲虽然对修正主义有所欣赏,但他们必将比修正主义走得更远。无怪乎,有学者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用修正主义都难以描述的“祛魅”的“马克思主义”^④。

第三种危机应对方式是索列尔的“革命的工团主义”。索列尔与伯恩斯坦一样都反对从经济基础上来推导出阶级的同一性,但与伯恩斯坦不同之处在于,他并不赞成“和平长入论”,而是倾向于运用现实的政治斗争来凝聚和塑造无产阶级。索列尔认为,由于社会主义的前景充满了不确定性,只有通过革命暴力手段,将“总罢工”持续坚持下去,才能从日益复杂的社会阶级构成中维护无产阶级的纯洁性,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不断修复或重构工人阶级的同一性。但问题在于,在充满大量偶然性与不确定因素的社会前提下,是什么可以保证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同一性呢?这里就涉及索列尔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问题了。

在索列尔那里,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分析社会的科学的理论工具,它更是使工人阶级得以同一的意识形态。当社会结构不再呈现出简单的阶级结构,社会关系不再建立在阶级划分与定位的基础上,而是多种复杂成分混合而成时,阶级的同一的可能性就不再是由经济基础来决定,也不是由国家政治来构造,而是在于一个阶级能否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其他社会集

① [英]拉克劳、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第32页。

② [英]拉克劳、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第38页。

③ [英]拉克劳、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第39页。

④ 参见周凡《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发生学探索》,载周凡、李惠斌《后马克思主义》,序言第9页。

团。工人阶级能否取得革命的优先主体地位,也就在于它能否将其坚强的革命意志上升为革命过程中的强势意志。这就是说,工人阶级的同一性取决于一种“语言符号”的神话理论,而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一种意志性的神话。至此我们可以看出,索列尔之所以要鼓吹暴力运动,乃是把暴力运动看作锻炼、塑造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方式,确保无产阶级同一的手段。虽然在索列尔提出的通过暴力手段凝聚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设想中,已经排斥了经济决定论和阶级还原论立场上的阶级同一性,但是其对阶级同一性的设想依然存在。而拉克劳与墨菲则坚决认为用“意志性的神话”来使无产阶级同一化本身就是无法实现的“神话”,任何意志都无法确保阶级的同一性存在。

至此,拉克劳与墨菲通过对考茨基、伯恩斯坦、索列尔思想的考察说明工人阶级的同一性无论是在经济、还是政治、意识上都无法得到保证。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经济结构变化导致的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全球化与反全球化运动、生态主义运动、消费主义与反消费主义运动、女权主义运动、民族主义运动等兴起导致的社会斗争的丰富性、复杂性、多元性进一步加强,阶级同一性必将走向解体,任何寻求革命主体同一性的理论吁求与实践努力都将会以失败告终。拉克劳与墨菲自称其所创立的后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面临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困境之下探索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道路。

二、在考察霸权理论谱系中阐发后马克思主义核心思想的发生学依据

拉克劳与墨菲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危机应对史的梳理至少在他们那里要阐明如下观点:马克思主义危机的确存在;三种代表性的危机应对方式都无法消除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上述三种危机应对方式之所以失败的根源在于依然坚持了阶级同一论和工人阶级革命主体论;阶级同一论和工人阶级革命主体论的假象已经破

碎。那么消除马克思主义危机的路径何在呢?或者说如何让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获得新生的革命力量?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只有激活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中的霸权思想才能重整革命之河山。正是如此,霸权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后马克思主义的“代名词”^①,并且“霸权话语必须树立的目标是,不仅将自己定位为诸多选择中的一种选择,而且将自己定位为能够解决危机的唯一可能的框架”^②。霸权理论也成了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这里的霸权,其内涵是指一个政治集团能把一种特殊话语合法化或上升为普遍话语的能力及其相应采取的政治行为和构建的政治形式。拉克劳和墨菲认为他们的霸权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中固有的霸权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为此,拉克劳和墨菲对他们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内的霸权理论谱系进行了系统的考察。

在考察霸权理论谱系中,拉克劳与墨菲首先引入卢森堡的“双重空场”来为其霸权理论的出场设定最初的“问题引爆线”。拉克劳与墨菲认为卢森堡虽然敏锐地感受到了政治斗争中的自发性所蕴藏着的惊人的历史偶然性逻辑,但囿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必然性作用的信奉,却用必然性将自发性中蕴含的偶然性逻辑严格地限制住了^③,造成了偶然性逻辑本来是要来填补因必然性退场而形成的“空场”。但必然性的退场是幽灵式的退场,偶然性逻辑还是要受到必然性的不正当支配,偶然性逻辑只是一闪而过地退场了,这便又形成了另一个“空场”。拉克劳与墨菲通过对卢森堡理论中“双重空场”的论述来说明,卢森堡虽然通过自发性概念触摸到了霸权逻辑,但这一逻辑由于卢森堡的人为限定而没有得到应有的展开,只是为后马克思主义霸权理论的登场揭开了帷幕的一角。

拉克劳与墨菲根据佩里·安德森的考证认为霸权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俄国社会民主党那里,并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渐次地曾经

① 参见陈学明《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历程》(第4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92页。

② [美]安娜·史密斯《拉克劳与墨菲》,付琼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26页。

③ 参见[英]拉克劳、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第8页。

出现了三种霸权概念。首先是主要由普列汉诺夫所阐发的“任务霸权”。其基本含义是指俄国资产阶级无力承担起他们应该承担的争取自由的斗争任务,进而由无产阶级代替软弱的资产阶级来完成该项任务,但无产阶级本身的任务是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完成资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就成了无产阶级完成其自身革命任务的垫脚石^①。这样就形成了任务的阶级与执行任务的历史代表之间的分裂,这种分裂是历史的偶然性给予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最难得的契机。如此,霸权在普列汉诺夫那里就成了由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之间错位而形成的一种不规则的关系了。

拉克劳与墨菲认为任务霸权虽然展现了偶然性逻辑,但在普列汉诺夫那里,无产阶级必须要遵从历史必然性而将自己登上历史舞台的时间延迟,且一直要延迟到替资产阶级完成任务之后才能正式登上社会主义革命舞台。如此,普列汉诺夫的霸权思想不仅依然被必然性逻辑禁锢着,同时也没有真正领悟霸权之深意。霸权原本就是蕴含着对自己界限外的历史集团及其任务进行“领导”的意思,其本身就标示着“领导”越界,只有越界的“领导”才能称作霸权。普列汉诺夫却始终在无阶级任务与资产阶级任务之间进行划界,而且将实质上已经承担了资产阶级任务的无产阶级的历史活动严格地限定在先验划定的无产阶级任务界限之内。这一切使得任务霸权对于后马克思主义霸权理论的启发只是象征性的。

霸权谱系的第二阶段是列宁所代表的阶级联盟思想中的“政治霸权”。列宁在霸权谱系中被拉克劳与墨菲称作打开朝向“未来霸权”之缺口的人物,其主张的政治霸权是马克思主义霸权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突破。拉克劳与墨菲认为随着群众斗争范围的扩大和领域的更加复杂化,列宁为了扩大无产阶级与其政党的同一性范围,采取了与其他阶级、阶层的群众

性斗争主体进行策略性联合的方针。这样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给予工人阶级的本体论优先权从社会基础变成了群众运动的领导权”^②。不过,在这种更多地带有实用主义政治策略的霸权实践中,则容易导致民主与权力实践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其仍然存在诸多难题。第一,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无产阶级具有明确界限,但不同斗争主体在联合中执行同一个任务必然会瓦解同盟体内部阶级、阶层的界限,如此会造成无产阶级的同一性理论与具体实践之间的矛盾。第二,由于群众运动存在民主性的特征,霸权领域的政治实践就很难体现出严密的阶级性。“一旦领导力量把群众的需要纳入到自身的特性之中,它怎样能保持自己严格的无产阶级特征?”^③第三,党作为霸权主体,一方面代表阶级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政治实践中又无法真正代表他们所要代表的阶级利益,如此霸权的主体地位的稳定性就受到影响。第四,大量主体立场的联合本身就是不稳定的,多重立场的联合主体暗中也破坏着霸权的有效性。总之,拉克劳与墨菲认为霸权思想在列宁那里已经出现,并通过与经济主义的初步分裂而在实践中成为可能^④。

但在拉克劳与墨菲看来,列宁虽然在传统马克思主义所信奉的经济主义的政治逻辑上打开了一个明显的缺口,但同时他依然把各类斗争主体看作是阶级主体,并给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赋予了一种先验的政治优先性。也就是说列宁的霸权理论还是具有阶级还原论的成分,其霸权实践中的政治要素尚未达致自由结合的境界,还是被“阶级主体”所牵制。如此,列宁的霸权理论自然也是拉克劳与墨菲最终所不能认同的。他们所要求的是“一种跟经济主义和还原论的马克思主义观念作比列宁所实现的更加激进的决裂”^⑤。于是他们把目光投向了葛兰西。

他们为什么要把目光投向葛兰西呢?第

① 参见[英]拉克劳、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第51、54页。

② [英]拉克劳、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第59页。

③ [英]拉克劳、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第67页。

④ 参见[英]拉克劳、墨菲《社会主义的战略,下一步在哪里》,周凡译,载周凡、李惠斌《后马克思主义》,第55页。

⑤ [英]拉克劳、墨菲《社会主义的战略,下一步在哪里》,周凡译,载周凡、李惠斌《后马克思主义》,第58页。

一,拉克劳与墨菲认为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吸收了列宁主义那里所存在的一切思想潜力^①。这不仅预示着葛兰西霸权理论是马克思主义霸权谱系中的更高阶段,同时也是拉克劳与墨菲对自己后马克思主义性质定位的一种理论声张。如果拉克劳与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的霸权理论是葛兰西霸权理论的逻辑延伸,自然也就是列宁主义的一种别样的延续,这样后马克思主义自然也就可以规划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之内了。第二,在葛兰西那里,“霸权不再被构想成对预先构成主体所施加的政治领导,而是构想为‘政治的、智识的和道德的领导’,正是通过这一领导形式新的政治主体被创造出来”^②。这说明任何政治主体,当然包括阶级主体在内都不是先验的客观存在,而是被构想出来的政治产物。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吻合了后马克思主义对政治主体构想的要求,即“政治主体构想为不同于阶级并比阶级更加宽泛,通过社会主义力量必得考虑、也能够接合的多种多样民主矛盾,这些政治主体得以不断地被构建起来”^③。但拉克劳与墨菲对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并不满意。在2001年的一次访谈中,墨菲回忆了写作《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时的背景并指出,“在葛兰西那里,仍然存在经济主义和本质主义的因素……这正是导致我与恩斯特·拉克劳详细阐发我们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一书中称作‘后马克思主义’的部分原因”^④。不可否认葛兰西对后马克思主义创立的思想启发意义,但这最多也只是“部分原因”,在理论上促发后马克思主义得以出场最为关键原因、最为重要因素又是什么呢?

三、臆想的发生学与实际的理论场域

拉克劳与墨菲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危机应对史和霸权理论谱系的梳理,努力将其后马克思

主义理论的出场置放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层面上,让人感觉到其理论是在不断克服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系列的理论失误,同时也在吸收了卢森堡、列宁、葛兰西等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内部的逻辑延伸。英国著名后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西姆就认为后马克思主义“试图在作为全球文化与政治力量的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晚期的崩溃中拯救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许多方面,并对它进行重新调整定位以使之在迅速变化的文化潮流中呈现出新的意义”^⑤。

事实果真如此吗?其实,拉克劳与墨菲之所以要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考察来逐步阐发他们自己的思想,一个重要的就是要验明正身,其后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一种合法继承与发扬光大。我们不要被拉克劳与墨菲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梳理所迷惑了。这种梳理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实际,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危机应对史还是霸权理论谱系考察都是拉克劳和墨菲为了证明他们思想的“合法性”,使自己的理论能“名正言顺”地纳入马克思主义系统中所采取的一种学术手段,一种典型的“结论先于论证”的理论臆想。

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中,拉克劳与墨菲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还是尽量给人一种是对马克思主义“接着讲”的感觉。《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内在运动的辩证法:从支配第二国际的经济主义到发生在索列尔和葛兰西著作中……的社会激进化政治观。那么,我们的后现代主义,则只是在主导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历史运动中又向前迈进的一步”^⑥。这一步最起码在表面上还是借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梳理的方式来跨出的,还是

① 参见[英]拉克劳、墨菲《社会主义的战略,下一步在哪里》,周凡译,载周凡、李惠斌《后马克思主义》,第58页。

② [英]拉克劳、墨菲《社会主义的战略,下一步在哪里》,周凡译,载周凡、李惠斌《后马克思主义》,第58页。

③ [英]拉克劳、墨菲《社会主义的战略,下一步在哪里》,周凡译,载周凡、李惠斌《后马克思主义》,第58页。

④ [英]墨菲《尚塔尔·墨菲谈竞争主义、卡尔·施密特以及激情在政治中的作用》,山小琪编译,载周凡、李惠斌《后马克思主义》,第169页。

⑤ Start Sim, *Post-Marxism,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 1.

⑥ [英]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孔明安、刘振怡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46页。

借助所谓的“逻辑延伸”来实现的。而在 1990 出版的《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中,拉克劳已直言不讳地指出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次“断裂”。但在拉克劳看来,这种断裂并不预示着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无关,也并不表明后马克思主义拒绝了马克思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发生了断裂,后马克思主义抓住的是断裂之后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众多碎片中最好的部分^①。这说明,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真正催生后马克思主义发生的理论场域,后马克思主义也并不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必然的“逻辑延伸”。

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理论场域催生了后马克思主义呢?“有三个来源激发我工作的灵感:现象学、后分析哲学,以及其他总体上称为后结构主义的思潮”^②。墨菲也曾指出导致他们撰写《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更重要的因素是尝试着把拉康、德里达、福柯等后结构主义者思想家所阐发的政治理论运用到我们的研究中和政治实践中”^③。原来现象学以及后分析哲学、后结构主义、后精神分析学等后现代主义思潮才是后马克思主义得以发生的真正的理论场域。通过对后马克思主义深入考察,不难发现正是后现代主义中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解构主义、多元化思想、话语理论等促发了拉克劳与墨菲学术灵感,成了后马克思主义主要的理论基础。正是如此,后马克思主义一经出炉,就遭到众多马克思主义者或西方左派人士的批判。伍德批判后马克思主义者为“新的‘真正社会主义者’”,密里班德称其为“新修正主义者”,詹姆逊称其为“第二代的修正主义者”,杰文斯则嘲讽后马克思主义是“学术歪风的高级阶段”和“空洞的非马克思主义”。当代美国著名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福斯特告诫像拉克劳与墨菲一样的后马克思主义者,当今世界并不

是一个“后马克思主义世界”,各类新社会运动“虽然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但它们要想实现自己的目标,就不能脱离以阶级为基础的运动……只有阶级运动才是一种能够形成和改善整个生产方式并推动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运动的世界历史力量”^④。

四、余 论

后马克思主义从羞羞答答的“逻辑延伸”出发,千方百计地试图将后马克思主义论证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新发展和新样式,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合法继承与发展。但无论是考茨基、伯恩斯坦还是索列尔,其主要理论观点本身就难以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围中,其更多地体现出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背离,将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牵强附会地说成是为了应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危机,这本身就是理论研究上“非法”行为。正如伍德所批判的那样,《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实际上是把欧洲左派中具有右倾倾向的那一个小派别的核心立场一股脑地摺在了一起”^⑤。如此,所谓的“逻辑延伸”也只是拉克劳与墨菲的理论臆断。他们通过对所谓的危机应对史的梳理,其最终目的无非是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错误地认定为“经济本质主义”的产物,指责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很难与当代急速变化的社会发展相适应,从而得出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过时的错误结论。我们认为拉克劳与墨菲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指认为“经济本质主义”本身就是不恰当的。我们承认在第二国际理论家那里,确实存在过单纯地从经济因素出发分析历史、社会问题的现象,这种错误思维方式也的确对马克思主义发展产生过较大的负面影响,甚至直到今天这种影响或多或少依然存在,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绝不是“唯经济主义”。正如恩格斯指

① [英]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第 241~242 页。

② [英]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第 256 页。

③ [英]墨菲《尚塔尔·墨菲谈竞争主义、卡尔·施密特以及激情在政治中的作用》,山小琪编译,载周凡、李惠斌《后马克思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年,第 169 页。

④ [美]福斯特《这不是后资本主义世界,也不是后马克思主义世界》,黄文前译,载李惠斌、李朝晖《后资本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年,第 238 页。

⑤ Ellen Wood, *The Retreat from Class*, London & New York: Verso, 1986, p. 47.

出那样,“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①。正是因为这样,“这就给了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进行曲解或歪曲”^②。虽然我们并不把后马克思主义看作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上“敌人”,但拉克劳和墨菲曲解和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则是可以肯定的。

在霸权理论谱系考察中,他们更多地不是在研究卢森堡的霸权思想而是在揣测卢森堡的霸权思想,人为制造了卢森堡理论中的“两个空场”,他们不仅没有正确把握列宁“霸权思想”中所蕴含的有关革命主体、革命道路的深刻内涵,更是“抛弃了葛兰西霸权理论中社会结构的决定作用,把霸权理论的能动性发挥到了超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基础的程度”^③。

结合危机应对史的梳理和霸权谱系的考察两个方面综合来看,拉克劳与墨菲宣称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延伸”是不成立的,如果真的存在所谓的“逻辑延伸”也只能是名义上。“后马克思主义者肯定和继承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是一种抽象的理想、抽象的精神意义上的肯定和继承”^④。也就是说,后马克思主义这种思潮无非借用了

“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援引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一些内容,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些范畴,实际上,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相去甚远,所以是一种虚假的逻辑延伸,本质上是一次真实的思想断裂。这种断裂也并不是拉克劳与墨菲所说的那样,后马克思主义抓住了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已经发生断裂后形成的思想碎片,而是后马克思主义已经越过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底线,既不承认经济意义上的阶级的存在,也否认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这就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发生了断裂”的问题,而是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根本问题上存在区别,本质上不能规划在一个思想阵营内了。不过在这里也需要指出的是,不能规划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的思想并不代表其就没有价值可言,后马克思主义在一定意义上察觉到了当今社会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社会主义在西方实现的道路日益复杂化,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一些理论难题,甚至是理论困境,并在此基础上积极借用多种学术话语、理论资源试图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中的一些问题作出自己富有个性化的解答,其理论探索精神依然是可贵的,虽其得出的主要结论我们未必同意,但某些理论观点还具有一定启发意义,值得我们认真去思考。

责任编辑:徐玲英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26页。

③ 付文忠《新社会运动与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后马克思主义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3页。

④ 陈炳辉等《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4页。